

陈安先
著

广州流花三角



100003

广州流花三角

陈安先 著

花城出版社

725-24 C1

内 容 提 要

广州流花地区人称“金三角”，也叫“黑三角”。“黑三角”藏污纳垢。“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在发财欲望的驱使下，所谓的东北虎、西北虎，湖南帮、潮汕帮，东邪西毒，南娼北盗，都在这里麇集；盗窃、抢劫、诈骗、赌博，胡作非为，无所不有，许多人在这里不明不白地破财丢命，酿出了一幕幕悲剧，这就是《广州流花三角》这部中篇纪实文学描写的令人触目的景象。

该书还收入了《逃港者》，此文描写逃港者在逃港途中淹死、摔死和遭到“人蛇”残害的一出惨剧；《弱者，不是女人的名字》一文则记叙了轰动一时的汕头“六·二六”案件，令读者惊心动魄。

本书作者长期生活在公安战线，在这本书中，他向读者披露的许多真实的鲜为人知的案件以及人们感兴趣的故事，都经过严格挑选，因而既有可靠性，又有可读性，还有新闻性，是近年来纪实文学中较好的选本。

广 州 流 花 三 角

陈安先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十一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67,000字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920册

ISBN 7-5360-0565-2/I·515

定价：8.00元

目 录

现代生活评判的视觉转换

——序	谢望新 1
广州流花三角	7
逃港者	57
弱者，不是女人的名字	102
“祝前途光明”	155
珠江的浮力	173
面对南来的风	196
血路	226

现代生活评判的视觉转换

——序

谢望新

我和陈安先是朋友式的编者与作者的关系。在《花城》杂志任职期间，我和已赴澳大利亚留学的刘剑星君一起编发过他的三部报告文学。但我始终没有向他问起过有关个人的身世、经历。只是我的直觉告诉我：性格的内向、沉稳，待人的诚恳、清纯，事业的勤勉、进取，构成了陈安先人生的基调。他是一个很能接纳外部世界的人。直到为他的这本集子写序，读了散文体的报告文学《“祝前途光明”》，才知道他与曾轰动广东的新闻人物——相隔一月先后以全国总分第一名、第二名成绩录取美国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粒子”研究生的李大西，是初中时代的同学、密友。

一个出身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弟，在科学艺术的成就上要进入社会的高层甚至顶端，磨难自然要比常人更无以复加，奉献也自然要比常人更难以想像。李大西奉行：命运给予打击用多大的作用力，将给命运的还击以同等的反作用力。在处理与外在环境的关系上，无论处于何种逆境，何种非正常非人性的氛围中，甚至看似毁灭性的打击面前，精神与心态，始终处于强者的地位。

从纯文学的角度看,《“祝前途光明”》也是陈安先迄今所发表的报告文学中,写得最真挚动情、最自如漂亮的一篇。他不是在用笔机械地摹写,而是在记录心灵情绪跃动的种种音符。

“文化大革命”中期,陈安先选择了那个年代最好的出路——从军。而工农兵大学生的李大西,则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又有幸进入高等学府中山大学深造。李大西的智慧在日益喷薄。与朋友星辰月亮太阳的光芒相比,陈安先的成就并不显赫。但是,他矢志不渝地坚守自己幼时的人生志向——文学之路。在众多的文学样式中,他终于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职业特点与个性才华的报告文学写作。

近五六年的辛劳,终见成效:《弱者,不是女人的名字》获广东省第五届(1985—1986)新人新作奖,在全国首届(1976—1988)金盾文学奖中,名列报告文学奖项榜首。在广东地方和军内,他的知名度日见增高。

作为一名军人,一名南国军人,一名南国军人业余作家,陈安先对时代性的变化征兆,逐步呈现出一种开放的思维状态,这是十分可贵的。相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军人的思想、意识、观念和思维比较稳固、稳定。而一旦军人不仅成为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而且成为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者,这不仅表明改革、开放覆盖面在扩展,更意味这相对稳固、稳定的一部分机制也在开始萌动,生长出新思想、新意识、新观念、新思维的果实。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演变史证明:惟有军人与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一道成为改革与开放、民主与法制的中坚力量,民族国家的发达与振兴才不可逆转,才可能顺利抵达彼岸。

当然，观念乃至观念制约下视觉的转换，需要一个渐进、累积的过程。过程之中也可能出现突变、突破性的进展。

近十年，陈安先一直在武装警察部队广东省总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当他最初观察边境前沿时，目光无可避免地被旧有的框架所障碍，看到的仍然只是“腐蚀”的一面。在对资本主义货币进行批判时，不惜引用马克·吐温的名篇《一百万英镑的钞票》，巴尔扎克的名篇《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中的故事进行辛辣然而再简单不过的嘲弄。结论也是现成的：“一条小街，两个世界。”（《戍守沙头角》，见《花城》1984年第二期）

可是，当他不再只是微观地着眼于某个具体的生活现象和事实，而是开始用一种社会整体变动的视觉及文化的眼光，来观察现实，他的整个感觉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对的是“南来的风”，仅存的不只是咸涩味与腥臭味，还有潮润、芬芳的气息。陈安先由视觉的转换，带来感觉的转换，再带来认识的转换。他开始有意识地寻找习习南风吹拂下那极富生气极富魅力的新鲜事物和新的人物。报告文学《面对南来的风》，正是反映这种悄然而终至骤然变化的一个良好开端。“政治边防”、“红色边防”的观念与手段，被改造、融汇与开放型的价值再创造所取代。那些适应乃至处于时代潮流浪尖上的军人之花，得到了保护与扶植。固有的与强烈排他的观念，被“竞争”与“兼容”的现代双重品格所取代。现代社会与现代人将趋向完整。

陈安先还敏锐地感觉到了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那些最早富裕起来的边民中的优秀分子，发现了教育对于经济的竞争，对于人才的积蓄，对于民族素质的提

高，对于未来所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如果不是用经济的力量来扶助教育，而是反过来过分强调教育自身直接的经济目的，甚至教育完全商品化、商业化，忽略人的知识的丰富、才华的掘进与品位的提高等因素，那是更加可悲的（《今日“大同村”》，见《特区文学》1987年第一期）。

近期，当他从世界性的“偷渡”现象，来考察建国四十年来广东四次逃港浪潮，陈安先对现实的看法更具一种历史反思的客观性、公允性与逻辑力量。使这个极为敏感的论题在他那里表述与剖析得令人心悦诚服。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开发区，也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同样有着圣洁与罪恶，崇高与卑微的双重性。但是，现代西方社会所表现的物质文明，与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文明成分，对落后国家、落后地区仍然具有无法摆脱的诱惑力。陈安先在他的《逃港者》的报告文学中，修正了历史传统看法之后的第一个结论是：香港不是“天堂”，但也不是“地狱”，“香港在人间”。陈安先第二个结论的深刻性在于，他不仅指认了逃港现象背后巨大的经济动因，而且勇敢地揭示出了我们特殊国情下，政治因素与信仰因素的不可推委的责任。这样，陈安先对现实的认同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他的整个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在现实的自身调整中也得到健全与完善，南国军人作家那种与南国现实运动同步的开放性，是最可宝贵的文学品格与人生价值导向。

报告文学《辩护律师》（见《花城》1987年第一期），也可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它所提供的新闻事实也许不是最重要的，在文学上也不是十分精彩的，但渗透其中的国家责任感与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力量则是光彩夺目的。陈安先较早地

从现实民众遭受种种不公正的命运中，意识到律师制度作为健全民主与法制制度的紧迫性与必要性。作家从揭露律师被驱逐出法庭的具体事件，联想到律师在行使权利过程中遭到拘捕、殴打、游斗等种种非正常现象，进而对世界和中国律师制度作了历史的溯源。维护民主权利的律师，反而被践踏了民主的权利。而律师制度在人类社会的出现，一开始就对封建专制、等级制度、宗教特权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现行的律师制度，是民主与法制健全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对执政党、政府及其他司法机关可以起到监察与审评的作用。对于制约权力膨胀与滥用等种种腐败现象，建立民主政治与法制秩序，维护普通民众的人权、人生、人身利益具有舆论与法的威慑作用。在西方，律师作为重要的一个社会阶层，还有更多机会直接参与国家管理，成为各级政府高层领导的重要候选者。一位军人业余作家，对民主权利和民主制度表现出如此清醒的意识与渴念之情，也可看作当代军人观念与意识的历史性的进取。

陈安先在构思与写作《弱者，不是女人的名字》的过程中，试图探讨我国现行的人才制度、人才结构与人才“本位”的问题。陈仲芝是著名女法医，但她所得到的，与她同时代的一些佼佼者相比，极不相称。这也是我们干部制度改革迟缓的重要原因。作家的这种潜在动机，因碍于现实的种种因由，在大量生动、丰富的刑侦事实叙述中，淡化了。从而削弱了作品的思想锋芒。

和陈安先的为人一样，平实、质朴也是他的报告文学的特点。我总希望，他今后的创作，能多吸取一点他中学时代的伙伴、挚友、纽约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李大西的个性精华，

注入多一些反衡与激越的成分。在当今新闻法仍迟迟未出笼的现状下，报告文学已经承担了新闻的很大一部分的社会责任与批判及舆论监督的职能。已过不惑之年的陈安先，思想的成熟，必将伴随着对社会与人生更多的投入。

1989年5月9日于广州东山湖畔

广州流花三角

背着背包，扛着行李，穿着灰蒙蒙衣服的外省人像放开了闸门的洪水，从广州火车站奔泻而出。车站广场上，密密麻麻全是人。坐在背包上“甩老K”的，躺在花基里睡大觉的，向路人不停鞠躬伸手讨钱的，还有睁大眼睛捡起地上的香蕉皮吃的……

春节之后，每天都有十来万外省民工涌入广州。

沿线火车站在告急：列车上的弹簧压扁了，火车开不动了；车窗玻璃给砸破，爬窗的和车里的人打起来了；铁路沿线还有几十万人挤压在火车站里，准备南下广州……

广东省叶选平省长也在告急，向全省告急，也向外省告急。他亲自主持召开全省紧急电话会议，亲任外来人员疏导领导小组组长，并派出五个工作组奔赴外省。

滚滚南下的巨大盲流慢慢地回涌了，然而，仍有许许多多的人不愿离开广州，并酿出了许多悲剧。

《羊城晚报》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报道：有个外省男青年，来穗后找不到工作，又丢了财物，绝望之中跳进珠江，幸被轮渡上的乘客救起。也是《羊城晚报》报道：有位盲流来广州的女青年，找不到工作，感到无脸返乡，绝望之中，冲着呼啸而来的火车，卧倒在铁轨上。

而有些人，则走上了偷和抢的道路。《广州日报》二月四日报道，一个河南省来的男人一直找不到工做，钱又用光了，便铤而走险，在火车站广场割人的钱包，当场给警察抓获。《羊城晚报》也报道：广州市一住户，被几个外来人员冲入厨房，将食物全部吃个精光。还有一户住宅，被一群外来人突然“进驻”。公安部门出动数十名警察才把他们劝走。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到三元里派出所，到广州市公安局流花分局采访的。

挤呀挤，挤呀挤，帽子挤歪了，领带也挤歪了，才挤过了对撞着，呼喊着，叫骂着的人海，来到了坐落在火车站西广场的流花分局。坐下一看，哎呀呀，一双刚擦过的皮鞋上印满了脚印。

我开始找人谈，并把一些人的谈话作了剪辑。

是“金三角”，也是“黑三角”

（他真帅。高高的个头。着一套西装。年轻，英俊，潇洒，风度翩翩。那些名噪一时的男影星和他站在一起也要逊色三分。他是流花分局的秘书科长，叫郭粤明。我和他是函大的同班同学。也许是同学，他分外热情，讲起来滔滔不绝。）

所谓流花三角地区，是指流花、矿泉、克山这一带。有人说，这里是“金三角”，也有人说这里是“黑三角”。依我看，这里是“金三角”，也是“黑三角”。“金”与“黑”并存，人与鬼同在。

这里是广州的交通枢纽，是咽喉地带，广州火车站、广州至九龙直达火车站、省汽车总站等五个大型车站全在这

里，民航售票处也在这里。这里，每天进出的客运火车有六十多列，长途客运汽车七百多班次，日均客流量十二三万人，节假日更是成倍成倍增加。我们管辖的范围不大，不到三平方公里。可在这小小的地面上，有中国大酒店、东方宾馆等十多家国内外都颇有名气的大宾馆，中小旅店就更多，有二百来间。边缘地带上的农民出租屋更惊人，有几千间。除了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还有两个工业品市场，一百四十多个商业服务网点，那些小摊档就数不胜数了。各行各业都抢着来这里赚钱做生意。从这点上说，这里是“金三角”。

这里又是“黑三角”，是广州治安问题的“毒瘤”。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常住在三角地区的外来违法犯罪人员有二三千人。有东北虎，西北虎，有湖南帮，潮汕帮。这帮家伙，盗窃，抢劫，诈骗，炒票，卖淫，赌博，胡作非为，残忍至极。一九八八年，我们受理旅客报案三千三百多起，最多的一天竟受理四十多起。这些几乎全是流窜犯干的。一九八八年我们分局抓获的流窜犯近千名，占全部作案成员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五。

我们的社会正处在动荡之中，人口在大流动，财和物也年我们在大流动，流窜犯罪成了这个时期治安问题的一大特点。你想写这方面的报告文学，有写头。

（黄文新，三元里派出所所长。年过四十，显得沉着老练。中上个头，长得结实硬朗。他介绍情况时，有数字，有事例，充满说服力。）

我们这里算是“黑三角”的边缘地带。我们这个派出所，前身叫三元里公社派出所，一九八〇年全所只有十九人。前几年一分为三，分成了三元里、矿泉、新市三个派出所，警力也从当年的十九人变成了一百五十多人，管辖的地盘还是

那样大。警察增加了七八倍，这个发展速度是不是太快了？不，按目前这种状况，再增加几倍也不算多。当年三个派出所合在一起的时候，发案数最高的一年是一百零八宗，而一九八八年，仅三元里派出所管辖的范围内，发生的案件就高达一千二百多宗，矿泉派出所管区内的案件数字更惊人。发案数增加了几十倍。更头痛的是大案要案越来越多，犯罪分子越来越残忍狡猾，给破案带来了很大困难。

（说到这里，黄所长站了起来，从文书那里搬来了一堆“情况登记”本。他抽出了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二十四日的那一本。）

一九八八年十至十一月间，半个月之内就发生了好几宗凶杀案。

（他翻开登记本念起来）

十月二十八日十二时二十五分，趣园楼酒家来电话：四〇五号房间发现一具死尸。死者男，三十二岁，甘肃同心县人，被人用绳子捆住手脚，左胸被捅了三刀，右腹被捅了二刀，地上留有血迹脚印。

（黄所长抬起了头，说道，后来查明，这是一个贩毒分子，是给同伙干掉的。他的同伙知道他贩毒赚了钱，就把他干掉，把钱拿走了。讲完，黄所长又继续念“情况登记”。）

十一月十一日，晚上八点三十分。两个小孩在桂花岗茶亭路边的人行道上卖棉胎，来了一男一女。男高一点七五米，约三十岁，脸长，较黑，烫发，穿半方格浅灰色西装，黑裤，黑皮鞋。女约一点六米，二十多岁，头发长、散，无烫发，上身穿手织毛线衫，圆领，红色。脚穿白色高跟皮鞋。两人都操外省口音。和小孩讨价还价时，这对男女把小孩的棉胎扔

到路边的栅栏下。在旁边卖棉胎的潘思森（三十三岁，男，浙江人）对这一男一女说：大人不要欺侮小孩。那一男一女即动手打潘，拳打脚踢。老乡把潘送去医院，抢救无效，当晚死亡。

十一月十四日深夜十二点，梓元岗一个小摊档前，一个外省人敲门买香烟。女店主打开门，外省人进去把门关上。当时里面吵吵闹闹。对门档主跑来报告巡逻队。三位警察开着摩托车赶去。女店主已被打死，倒在玻璃柜旁边，血流满地。

十一月十六日，广园新村七巷十九号两名老年妇女被砍死，其中一名七十六岁，被砍三十一刀，另一名六十岁，被砍十六刀。

（黄所长放下登记本，感慨万千。）

我们管辖的地盘只有五点八平方公里。在这小小范围内，二十天之内就发生四宗凶杀案，平均五天一宗，四天死一个人。这够可怕的了。过去是谋财害命，现在是害命谋财。不管你有钱没钱，也不管你给不给钱，先捅你两刀子才说。这些行凶抢劫的，多是“东北虎”和新疆人。

来自广东潮汕地区的流窜犯，则往往采取诈骗等手法，骗取钱财。他们诈骗的手法五花八门，受骗者不计其数。我带你去看看几件“贵重物品”，请你看后给估个价钱。

（黄所长带我走到房间一个角落。墙角，堆着几个崭新的尼龙袋。这是广东市场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的那种红条纹和白条纹相间的袋子。也许是那些条纹像蛇皮一样，有人叫它“蛇皮袋”。黄所长拉开了袋口的拉链，从袋子里取出一个包装“方便面”的纸皮箱。打开箱盖，里面装的不是方便面，而是

三块普普通通的红砖头。)

你猜猜看吧，这三块砖头值多少钱？

(我摇摇头。按正常价格，一块红砖头无非二三角钱。但我知道，我眼前这几块砖头决不是这个价钱。)

我想你猜不出来，这三块砖头每块一千一百元，三块共三千三百元。那两袋也是，每袋也是三块，每块也是一千多元。给你看一封信吧。

(黄所长递给我一封信。这是一封寄自甘肃兰州五〇八信箱的信。写信人一位姓李，一位姓崔。信写道：回兰州后，我们又细细回忆了一遍。现在把一些情况再向你们报告。引我们上钩的第一个人，年龄大约三十岁，长方脸，棱角分明，长头发，广东潮汕口音，习惯左手插裤兜，右手轻轻摆动。经常在广州火车站和三元里一带活动。他知道我们要买录相机，就走到我们跟前，说有便宜的录相机卖。他把我们带到三元里村找另一个人，拿出了一部G33录相机给我们看。讲好价钱后，他们把录相机装回尼龙袋。我们数三千三百元人民币给他们，提着尼龙袋回招待所。回来后打开一看，才发现袋子里装的是三块砖头。那两个家伙在我们数钱的时候把袋子换了。我们后悔已经来不及，唯一的办法只有请你们帮忙。在内地存三千多元不容易，请派出所同志务必想办法破案。破案之后，一定重谢。看完这样的信，我能发表什么评论呢？黄所长拿起“情况登记”本，又慢慢讲开了。)

换包，是骗术之一。刚才讲的是换“大包”，还有换“小包”的。我再给你念一个案例。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江西省宜春军分区干休所干部杨××在广州火车站下车后，有一个男青年缠住了他，要

同他换外币。事主经不住高价钱的诱惑，和他一起到了梓元岗。又来了一名男青年。讨价还价之后，最后讲定以一美元换七点五元人民币，一元外汇券换二元人民币的比率对换。案犯从衣袋里掏出一大叠一百元一张的人民币，数出了七千元，装进一个信封里。事主则数出六百六十八美元和一千元外汇券。案犯接过事主的钱后，把装钱的信封交给事主，匆匆走了。事主走到偏僻处，掏出信封里的钱一看，信封里装着的那叠钱，只有上下两张是一百元面额的人民币，中间夹着的全是废纸。

（简直像耍魔术。七千元瞬间成了废纸。但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受骗上当者那样马虎？为什么他们不再检查一遍？我向所长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慢条斯理地讲起来。）

刚才我讲的是十二月十三日的事。十二月十六日，来自广东惠来县的一名流窜犯，用一叠旧报纸骗去一名外省人一千零肆拾元；十二月十七日，一名湖北姓陈的旅客被相同手法骗去三千三百元；十二月二十一日，一名二十七岁的女青年被骗去四千五百元；十二月二十三日，天津一位姓王的旅客被骗去一张十一万三千元的汇款单……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短短十天之内，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盘，就有这么多人受骗，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个个都是马大哈？个个都是马虎虫？我想，最主要的一条，还是他们心虚。这些受骗者，可以说全是搞非法交易，做黑市买卖的。高价兑换外汇，购买走私录相机，这些都是非法的。所以，事主往往心情慌张，不敢从从容容进行检查。案犯也往往抓住事主这一心理状态行骗。你想再检查一遍，他们往往喊道：“警察来了，快跑。”他这么一叫，多数人往往拿起假货假钱就跑。你就是不跑，他也跑